政治外交

论萨尔浒之战前后后金与朝鲜的关系

刁书仁

[摘要] 史学界对于后金与朝鲜的关系，局限于中国史料，很少有人研究。本文利用朝鲜文献，探讨了萨尔浒之战前后朝鲜援兵问题、朝鲜双边外交问题以及明朝对后金与朝鲜之间关系的干预问题等等。

[关键词] 后金　朝鲜　宗藩关系

[中图分类号] K2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 (2001) 04-0043-08

**Relations between the Later Jin State and Korea
Before and After the Battle of Sarhu**

Due to the paucity of the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few scholars have research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ater Jin and Korea. Fully utilizing Korean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author discusses problems such as the reinforcement of Korean troops before and after the battle of Sarhu, the bilateral diplomacy of the Korean government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Ming government in the diplomacy between Korea and and the Later Jin.

史学界对于后金与朝鲜的关系问题，限于中国史料零散，很少有人研究。笔者近来检索朝鲜文献，拟对萨尔浒之战前后后金与朝鲜的关系作一论述。

一、萨尔浒之战前后朝鲜援兵问题

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举行即位大典，建元天命，国号后金。朝鲜方面对此事十分关注，同年五月，《三朝辽事实录》载："朝鲜咨报，奴酋僭号后金国，号汗，建元天命，指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词甚侮谩"[①]。李朝文献《光海君日记》对努尔哈赤建元称帝之事也有详细记载：

> 建州夷酋佟奴儿哈赤，本名东鞑。我国讹称其国为老（乙）可赤，此本酋名，非国名；酋本姓佟。其后或称金，以女真种故也。或称崔者，以其母吞雀卵而生酋故也。今者国号僭称金，中原人通谓之建州。[②]

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三月，努尔哈赤发布"告天七大恨"，宣布与明朝决裂，开始了后金与明朝的战争。同年四月，后金占领抚顺。五月十九日，攻下抚顺以北、铁岭以南的抚安堡、花豹冲、三岔儿堡等大小 11 堡。二十日，招抚崔三屯及周围诸堡[③]，回师赫图阿拉。

抚顺等地失陷的消息传到京师，举朝震惊，万历皇帝在给兵部的上谕中云：

> 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尔部便会推堪任总兵官一员，令刻其到任料理军务，一应防御驱剿事宜，着督抚等官便宜调度，务期殄灭，以奠封疆。[④]

[收稿日期] 2001-6-30
[作者简介] 刁书仁（1954—），男，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沈阳 000035

兵部遵旨调兵遣将，启用废将李如柏镇守辽东，推兵部侍郎杨镐任辽东经略，原任总兵官杜松屯山海关。⑤

努尔哈赤攻陷抚顺以后，又率军一举攻下清河。明朝失清河及辽东诸堡，全辽震惊。据朝鲜陈奏使尹晖驰启：

> 奴酋本月二十一日围清河城，四更攻城，二十二日未时城陷。游击中军及添兵游击俱被害，军兵及居民五万余人，或被虏，或被杀。辽东总兵及都司率兵登城防备，辽广骚扰，五六十里人烟不通。⑥

抚顺、清河等城接连失陷，明廷“举朝震骇”⑦，认为一个小小的“建州夷”，竟敢冒犯天朝大国。一时之间，明廷上下主张立即“大张声讨”努尔哈赤之声不绝于耳。万历皇帝决定倾其国力，一举消灭努尔哈赤，这就酿成了关乎明金兴亡的萨尔浒大战。

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企图消灭后金而发动的一次战争。为了进行这场战争，明廷战前忙于调兵、拨饷、督师等一系列准备。

朝鲜方面对明廷欲征后金是十分清楚的。他们知道，作为明朝的属国，势必卷入这场战争。果然不出其所料，同年六月，明钦差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兼管备倭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维藩的咨文送到朝鲜，要求朝鲜派出“团练火器手七千作为声援，俟奴酋实有变动情形，本院另行知会，合兵征剿”⑧。紧接着又一道咨文到朝鲜，咨文曰：

> 今照建酋奴儿哈赤猥以属夷无端生事，计袭抚顺，公行叛逆，罪大恶极，法当诛讨。除请大兵至自另行外，诚念贵国密迩贼巢，不无惊疑，合行知会，申严防备。为此合行移咨贵国，烦为严行该属将领等官，加紧哨备，整练兵马，教演火器，相机防御，以张声势，俟剿奴之日，本院临时另咨知会，合兵征剿，先乞咨示，以便施行，须至咨者。⑨

此时朝鲜国王为光海君李珲。他于万历三十六年二月即位。在“壬辰战争”中他历尽磨难，其父宣祖国王多次奏请明廷册封他为世子，但始终未得恩准。迨其父去世，他即位后，明廷不予册封，“自称权署国事光海君”⑩。后经过朝鲜使臣多次赴明奔波及贿赂明朝官员后才于同年七月被明廷册封为朝鲜国王⑪。他即位前后，对努尔哈赤崛起、建州女真连连得势的情况非常清楚，加上他参与国家重要决策，对朝鲜国力民生十分熟悉。所以，在处理与明朝的关系上，常常显得左右摇摆。对明朝要求朝鲜出兵援助一事，他持消极或拖延的态度。

明廷咨文到朝鲜要求“合兵征剿”的同时，建州努尔哈赤也先后两次派人送来书信，“语意凶悖”，“至以七宗恼恨仇怨天朝”，希望朝鲜在辽东战事中保持中立。在这种朝鲜对明、金关系需要抉择的关键时刻，备边司发表了如下意见：

> 奴酋情形之凶逆，兵力之鸱张，十余年来已作难当之虏。非但境连我国，有早晚必噬之形，辽广各衙门亦皆忧之，今有岁年。今者无端生事，入犯边界，其乐祸之心，必不至于侵扰边上而已，虽以天下之兵，恐难剿灭。所谓女真兵满万，天下不能敌者也。此贼每称金之遗种，其穴完颜之地方，兵马之精强，不下于完颜。⑫

备边司的态度很明确，劝说国王李珲，努尔哈赤的实力即便不如明朝，但明朝也未必一举就能剿灭他，希望国王三思而行，谨慎处之。在君臣反复商议后，光海君决定给明朝回书，回书云：

> 我国以天朝藩邦，当固守藩蓄，非但自守之计也，情理亦如此矣。以不教弱卒，驱入贼窟，比如群羊攻虎，无益于征剿，其在我国反有不守之忧矣。⑬

回书婉转地表明，朝鲜出兵增援有困难。不久，明廷又有咨文询问朝鲜征兵情况，咨文曰：“剿奴日期，尚俟大军到齐，方定出征日期”，要求朝鲜方面速作准备，“毋致临时违误”⑭。

朝鲜在“援兵”的问题上，仍采取敷衍与拖延的策略。对于朝鲜在“援兵”问题上的态度，明朝已有所闻。为此，明钦差总督辽蓟等处军门经略汪可受在敬告朝鲜国王咨文中这样写道：

> 兹者建州小丑，据海壖之蕞壤，觞么魔之诸酋，靡念世受国恩，敢尔潜图鼠窃。国家熙泰，全不彼虑，乘时狂逞，掠

我城堡，戕我将士，罪逆滔天，神人共愤。皇上赫然，计必剿除。用调四方之锐，遄兴六月之师，输粮若阜，军气如雷。奴之期命，其焉至矣。王之忠情，谅有同心。乃奴之东鶣，与王壤界，国家劳攘如此，王能晏然而已乎？

本朝立国二百五十余年，王国受二百五十余年之庇。曩者王国一经倭奴之难，本朝即遣十万之师，竭蹶岁月，平荡倭氛。深量国王世笃忠贞，与王之克缵丕基也。虽国多故，乌容已其兴数万之师，夹攻奴酋，必剪必克，是王之报效本朝，而绵国无疆之祚者矣。是非以王之兵力，即灭奴酋也。[15]

汪可受的咨文的意思很清楚，明廷在“壬辰之役”中，救朝鲜于水火之中，现在明朝有难，朝鲜必须出兵相助，否则就会受到“知恩不报”、“不仁不义”的谴责。即便如此，光海君还是不肯改变“不欲应征兵之举”的主意。当时赞同光海君的大臣有任兖、尹晖、朴鼎吉等人。任兖上奏云：

当此人心不淑之时，调发大兵，远送上国，意外之患，安保其必无。天朝之于我国，有壬辰罔极之恩，宁以国毙，不可不送。但天下之生久矣，事变无穷，脱有土崩之患，难处之变，未知庙堂之上将何以处之？非特此也，我国西北两界，接连伊贼地方，今者扫一国之兵，而出送境上之后，若有虚虚实实，冲东击西之患，而如入无人之境，则亦未知庙堂之上将何以策应？[16]

然而，与光海君意见相左的亲明派大有人在。其代表为承文院大提学李尔瞻以及两司诸多人员。李尔瞻上奏反对说：

但念中国有难，诸侯入援，此春秋大义，藩守职分。况本国再造得至今日，秋毫帝力，未知所报[17]。

可见，朝臣围绕“援兵”问题分成两派，争论不休。光海君为了减少内部分歧、稳定政局，便派圣节使兼陈奏使朴鼎吉奉表赴明京师，婉转陈述朝鲜不能出兵辽东助战，且带大量银两，用于贿赂明廷官员，希望他们能反对“合兵征剿之举”[18]。

不过，辽东镇抚衙门的官员还是步步紧逼，令朝鲜特别为难的是经略杨镐的咨文。他要求朝鲜国王“数万之兵，虽不得充备，以整槊一万，听候境上”[19]。杨镐的咨文引起朝鲜统治层“亲明派”的共鸣，他们纷纷上疏要求将“脱明派”代表人物朴鼎吉、任兖等“断以其律，以正陷君误国之罪”[20]。备边司的奏文代表了亲明派同意朝鲜出“援兵”的意见：

伏乞圣明更加三思，无失事机，不胜幸甚。臣等揣量中朝事情，恐必有难处之患，故陈达下情。反复商确之际，自至差过时日，岂敢百般搪塞，故为迟延哉？今之事机，愈往愈难，大义所在，姑置忽论，而生衅于此贼其患轻，得罪于天朝其祸大，轻重自别，此臣等再三吁号而不知止也。[21]

朝鲜君臣关于是否向明“援兵”问题的争论，终于在万历四十七年初告一段落。

是年二月，朝鲜谢恩使申湜、圣节使尹晖等从明京师带回万历皇帝下达给朝鲜的“征兵合剿”的敕书。敕书云：

朕治垂一统，守在四夷，当重译贡琛之时，息鸣镝控弦之警。乃建州遗孽，款塞穷酋，犬羊屡餍于贪饕，狼豕不虞其奔突，荡摇我边鄙，荼毒我士民。汉过不先，朕怒斯赫，爰整张皇之旅，用宣挞伐之威。惟尔朝鲜国王，恪守箕封，祗供藩职，愤兹丑夷，逆我颜行；奉大帅之檄文，集陪臣之谋议；籍兵一万以上，赋马七百有奇；遣间牒以侦虏情，购焰硝以饬火器。尔之不惮征缮，虑难勤王，亦足嘉已。兹将准部覆题给发马价、焰硝，用佐军实，仍遵宪庙旧例，颁赐敕书。尔命将提兵，申严纪律，听经略相机调遣，克日进征，务成犄角之形，遄奏荡平之绩。朕当不靳殊锡，以酬尔勋及尔将士。[22]

这样一来，光海君也不敢再以各种理由作不肯助兵辽东的借口了，立即命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带领三营兵马 13000 人，从昌城渡鸭绿江赴辽东。

萨尔浒之战是明朝精心策划、周密组织的战役。明军于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出师，号称兵力 20 余万人。誓师后，

明军兵分四路，直捣努尔哈赤老营赫图阿拉。朝鲜援军被编入南路军，配合刘綎作战。

努尔哈赤根据收集到的明军情报，早已准确地判断明军主力必定从抚顺方面来攻，他选择决战的战场在浑河和苏子河汇合处南岸的界藩山一带。

针对明军的部署，努尔哈赤制定出具体的作战方略，即集中优势兵力全力对付明军从抚顺方面来攻的这一路，采取“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23]的作战方针。

萨尔浒整个战役，仅仅5天，以后金的胜利和明军的溃败而告终。这次战役，明文武将领死亡310余员，军士死亡45870余人，阵失的马、骡、驼共28600余匹。[24]

那么，作为明朝联军，朝鲜援军在这场战役中又如何呢？朝鲜平安监司驰启中这样报告：

> 天朝大兵及我三营兵以（三月）初四日败绩于深河……我国左营将金应河继进，布阵于野次，设拒马木，兵才数千。贼乘胜薄之，应河令火炮齐放。贼骑中丸死者甚多，再进再退。忽西北风大起，尘沙晦冥，药飞火灭，炮无所施。贼以铁骑蹙之，左营兵遂败，死亡殆尽……元帅（姜弘立）将中营登山据险，形孤势弱，士卒不食已两日。贼悉众合围，士卒知必死，愤慨欲战。贼乃招我国胡译河瑞国，语以通和解兵之意，金景瑞先往虏营结约而还，又要（姜）弘立俱盟……遂与部下诸将李一元、安汝讷、文希圣、朴兰英、郑应井、金元福等各率所领兵马，投戈释甲，诣虏阵降。贼令弘立、景瑞将官率兵先行，贼兵拥入奴寨，奴酋只令弘立、景瑞入寨中，其余将领军兵皆置城外监守。[25]

上述史料详细记载了南路联军惨败及朝鲜援军姜弘立、金景瑞投降后金的情况。耐人寻味的是努尔哈赤对受降的朝鲜援军将领非但未杀，反而优待，半个月后，居然将姜弘立等释放回国。

二、后金争取朝鲜与朝鲜的双边外交

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一直关注与朝鲜的关系，特别是“七大恨”起兵攻明以后，更加注意与朝鲜的关系。他知道，只有争取朝鲜使其在明金关系上保持中立，就可以避免“腹背受敌”，全力征明。因此，积极争取朝鲜是后金重要的战略方针。

天命三年二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伐明的同时，先后两次派人送书于朝鲜，希望朝鲜保持中立态度。萨尔浒之战前，努尔哈赤对明廷要求朝鲜“助兵合剿”，朝鲜方面有“退托之意”，是了如指掌的。天命三年七月，杨镐给朝鲜的咨文下达不久，努尔哈赤派人去朝鲜进行工作。据朝鲜司宪府的报告：

> 满浦佥使金完，顷于胡差之来，私与以厚纸三十卷。厚纸乃火炮所用，非如寻常应求之物，而不禀朝廷，肆然赂遗以资贼虏；论以军律，合行枭示，而反下推考仍任之命，物情极为骇愕。况今奴酋构衅上国，事机情形可虞甚于前日。若或因此纸地之事，惹起意外难处之患，虽悔曷追？请金完姑先拿鞫定罪。[26]

后金使者到满浦进行工作，朝鲜官员竟然送礼物给后金使者，司宪府认为这是“肆然赂遗以资贼虏”的行为，要求将朝鲜官员金完“先拿鞫定罪”。而国王光海君并未追究此事，他似乎要继续与后金交往。果然，十几天后，努尔哈赤的又一封致光海君的信件到会宁，“胡书皮封以国王开拆书之，此与前日满浦所送之书其规一也”[27]。同年十月，国王光海君居然令给努尔哈赤写回书。书中大意曰：

> 尔营与我国共事天朝，天朝抚之甚厚，而今何以些少之嫌，背叛天朝乎？在我国之道，固当斥绝；而以大国之度，理宜包容。当于某月间整齐以待，汝其取去。毋作逆天之计，以尽事大之诚，终保两国之好，岂非幸乎[28]！

回书中婉转表明萨尔浒之战朝鲜出兵是迫不得已的“尽事大之诚”，希望后金“理宜包容”，以便“终保两国之好”。努尔哈赤对光海君的

回书心领神会。所以，萨尔浒之战中深河之役，朝鲜援军将领姜弘立等投降后，努尔哈赤待之甚厚。看来是早有背景，而姜弘立却道出事实真相。他说："臣至背东关岭，先遣胡译河瑞国密通于虏云：'往被上国催驱，至此常在阵后，不为接战计。顷战败之后，得以款好'。若速成和取口，臣等可以出归"。可见，投降后金是国王光海君与姜弘立的"素定之计"㉙。

萨尔浒之战后，努尔哈赤立即派人带着他的书信前往朝鲜。对此，朝鲜表示欢迎，"王令过江入城，款待赠物"㉚，并不顾大臣反对，拟好"答胡书"。答书内容如下：

> 洪惟两国境土相接，共为帝臣，同事天朝者二百年于兹，未尝有一毫嫌怨之意矣。不图近者贵国与天朝构衅，兵连祸结，以致生民涂炭，四郊多垒。岂但邻国之不幸，其在贵国，亦非好事也。天朝之于我国，犹父之于子也。父之有命，子敢不从乎？大义所在，固不得不然，而邻好之情，亦岂无之……自今以后，偕之大道，则天朝宠绥之典不日诞降，两国各守封疆，相修旧好，实是两国之福。㉛

从朝鲜的"答胡书"中，明显看出努尔哈赤对朝鲜工作的效果，以光海君为首的"脱明派"承认后金国，希望两国"各守封疆，相修旧好"。

努尔哈赤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于同年七月又致书于朝鲜曰：

> 来书曰"四郊多垒，其在贵国亦非好事。我国之于天朝，犹父之于子也。今后偕之大道，则天朝宠绥之典诞降"等语，谅必南朝所言也。且见南朝素常如此，谑言谍语，孤甚厌之。非孤奉书于国王，是伸孤素日之恼以闻国王也。并不回答，来书之语何据南朝之言，而差朝鲜之人也？今国王或意无静坐两间看变，则在国王不应看变，立定一心，要与孤断然同机，则我两国当写盟言之书，杀白马祭天，乌牛祭地，当天歃血，焚香盟誓，方为可信矣。㉜

努尔哈赤的回书，首先指出朝鲜期望明朝诞降"宠绥之典"是不可能的，明廷所能诞降朝鲜的只能是"差朝鲜之人"为之效命；又劝诫光海君认清形势，不要"静坐两间看变"，要当机立断与后金"焚香盟誓"。努尔哈赤的回书，在朝鲜君臣中引起强烈反响，有的大臣认为："今此胡书，悖慢极矣……彼虏即犬豕也，何可责以义理，只促危亡之祸哉！"㉝光海君也觉得努尔哈赤回书所言难以马上接受，决定对"胡书"给予答复。其文曰：

> 天朝差官已到本国，烦不敢一一云。而倭奴于我国有万世必报之仇也，纳款之后，无杀白马誓天之事，而今则服从我国所言……贵国言和，则所当即送掳去人物，以示和好之实；乃敢先戮数百壮士，外示无和之意乎？今若尽送被掳之人，一如倭奴所为，而听从我国之言，则岂无邻好之意乎？㉞

看来光海君从内心是想与后金交邻结好，如果努尔哈赤刷还所掠朝鲜人口，他完全可以与后金"焚香盟誓"。不过面临明朝的压力，亲明派的反对，双方国书频繁来往，实有不妥。所以，他指出"所重者和好，何用强求国书"㉟。以光海君为首的"脱明派"，企图实行双边外交，谈何容易？朝鲜国内"亲明派"大臣反对者有之，而来自明朝方面的压力更使光海君等难以招架。努尔哈赤争取朝鲜的计划难以实现。

三、明廷对朝鲜与后金交往的干预

如前所述，后金建立后，为了集中力量攻明，便积极争取朝鲜，尤其是萨尔浒之战后，加大争取的力度，不断派使赴朝，频繁来往书信，后金与朝鲜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松动。但是要想使朝鲜脱离明朝，仅几次使者往来、几封书信是难以解决的。从朝鲜同女真的关系看，朝鲜一直对女真怀有民族偏见，视女真为"犬羊之辈"，而朝鲜与明朝的宗藩关系可谓根深蒂固，明朝对朝鲜有"再造之恩"。虽然大明帝国如大厦将要倾倒，但在朝鲜人的心中，仍为可信赖的宗主国。而且，当时明朝本身尚未失去抵御努尔哈赤的能力。

正在努尔哈赤派人赴朝鲜向光海君递送"胡书"之际，明廷使臣常明臣便接踵而至，

向朝鲜国王递交了辽东经略杨镐的“揭帖”。“揭帖”云：

建贼逆天，王师行讨。贵藩守维屏之义，效同仇之举，征发万众，济江而西，忠节昭然，可揭日月，方期一鼓荡平，不谓两军失利，伤存悼没，疾首痛心，则皆不肖节制无方，经略无术之罪也。已经自劾藁外，恭念贤殿下不无宵旰之虑，谨驰一介，仰慰尊怀，惟胜负亦自兵家之常，在封疆无忽防御之策。㊱

明使常明臣奉命来朝鲜，代表明廷对朝鲜援兵之举，称赞为“忠节昭然，可揭日月”，虽然“两军失利”，但责任不在朝鲜援兵，而在于明廷“节制无方，经略无术之罪也”，并安慰朝鲜君臣，“胜负亦自兵家之常”，反映出明朝在积极笼络朝鲜。与此同时，明使之来也有窥视朝鲜与努尔哈赤动向之目的，说明明廷对朝鲜政局走向也是十分关注的。

此后，明金战局发展异常迅速，天命四年，努尔哈赤智取辽东重镇开原、铁岭，二城失陷，明朝损失甚大。明人评曰：此二城“为辽重蔽，既并陷贼，则河东已在贼握中”㊲。天命六年（天启元年），后金又夺取沈阳、辽阳。翌年，努尔哈赤又亲率大军攻取了广宁。这样一来，整个辽东战局为之一变。如明辽东经略王在晋所言：

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至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㊳

这期间，明廷曾多次呼吁朝鲜援助，但朝鲜均以各种借口婉言拒绝。

尽管朝鲜仍事明朝，但朝鲜与后金的私下往来，明廷是有所觉察的，并引起明廷君臣的注意。这从天命四年十月朝鲜千秋使李弘胄和圣节使南撲派人从北京送回徐光启和张至发的奏本中充分地体现出来。

徐光启，时任明廷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万历四十七年十月，他在给明神宗的奏本中，陈述了他对明金战事及朝鲜半岛政局的见解。徐光启在奏本中首先指出：努尔哈赤的崛起、后金的建立，使东北地区及周边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伏见逆奴稔祸，建国僭号，攻陷开原，将士覆没，辽阳、广宁，岌岌不保，关内人心，惶惶靡措，以其势非昔年之俺答，实宋朝之（金）兀术、完颜亮也。因条《边上事宜》，其内一款亟遣使臣监护朝鲜，以联外事势也。㊴

接着，徐光启陈述了金、鲜之间的关系。他说：

昨传谩书㊵恐喝，挑激鲜之君臣，事势狼狈，既为逊辞复之，继以败将俘军羁留为质㊶，且怵且诱，遂入牢笼；贽币饩牵，交酬还往，鲜、奴之交已合，荡然无复东方之虑矣。㊷

很显然，萨尔浒之战前后，努尔哈赤与光海君间“通书约和”的情况，明廷是知道的。所谓“鲜、奴之交已合”之语，虽然有些夸张之笔，但“鲜奴之交”较为频繁，确是事实。

徐光启在奏本中对朝鲜与后金之交必使努尔哈赤专心征明、从而出现不利于明朝的形势，这样分析道：

即使辽左尚存，而镇江、宽奠再有一失，朝鲜又为异域，后来合小攻大，鲜或不从，协从假道，易于反掌！况奴之狼戾无亲，鲸吞莫厌，弟婿至亲，皆杀而并之，何有鲜哉！㊸

徐光启认为，在这种不利于明廷的形势下，争取、控制朝鲜对扭转明与后金的形势至关重要。他提出，争取、控制朝鲜的方略是“监护其国”。他说：

臣之愚计，谓宜仿周汉古事，遣使宣谕，因以监护其国，时与阐明华夏君臣天经地义，加以日逐警醒，使念皇上复国洪恩㊹，无忘报答。再与点破奴贼之巧图恶并，是其故智，要盟伪约，岂足依凭？

鲜之君臣，明理蹈义，如此面命耳提，宁无感动发奋。察彼心神无二，就与商略戎机，令其渐强，可战可守。彼（努尔哈赤）若诱胁，情形变动，便当责以大义，一面密切奏闻，以便措置防范。大都出疆机事难可豫拟，总大指不出监护二端。㊺

他认为只有如此，“可以犄角成功”，“必胜之

术也"[46]。徐光启对朝鲜"监护其国"的主张，是基于宗主国与属国隶属关系角度考虑的，宗主国对属国有监护的权利，属国对宗主国有受其监护的义务，就明、鲜、金三国关系考虑也是明朝现实政治的需要。

为了尽快疏离朝鲜与后金的关系，使朝鲜对明朝"面命耳提"，徐光启自报奋勇，向明神宗请求作为特使赴朝"宣谕"此事[47]。

至于云南道御史张至发的奏本，则是从辽东战局角度来分析的。他认为，如果辽东为后金所得，那么，山海关以南的大明江山，将完全暴露给努尔哈赤，如果努尔哈赤再得到朝鲜的配合，那么大明帝国将岌岌可危![48]他在奏书中并没有像徐光启所说的那样，派人监护朝鲜，而是主张调集水兵，择善水战将领，"专督操练"[49]，既可以守卫中国海疆，又可以监视朝鲜。

四、朝鲜"亲明派"上台，后金争取朝鲜失败

徐光启、张至发二人奏本在朝鲜君臣中引起极大的反响。光海君看后，"不觉骨痛气窒，直欲蹈海钻地而未由也已……此人（光启）诬陷之惨，甚于丁应泰之变也"[50]。他认为徐光启奏本所说的是："自有东方以来曾所未闻，若不急急处置，则光启虽曰不来，又安知没有如光启者乎"[51]！他以为当务之急是派使赴明"快辨厚诬事"[52]。大臣们也有对徐光启所说不满者，如备边司官员的咨文中云：

> 徐光启疏辞以我国与奴贼结好为言者，满纸张皇，而一则曰"逊辞复之"，一则曰"遂入牢笼"，一则曰"赀币交酬"，一则曰"弃以资敌"，至以"监护"二字显作出使之名号，乃曰"情形变动，便当责以大义，密切奏闻，以便措置防范"云。[53]

认为徐氏所说言过其实，夸大其词。那么，如何消除明廷对朝鲜与后金关系的种种疑虑。备边司的官员看法如下：

> 自丧师之后，两帅[54]降在贼中，尚保凶喘，致令伊贼执而致书于我国，行间于中，转辗流播，疑以传疑，以至此耳。近观通报及前后使臣状启，中朝（按明朝）之疑我不独一光启而已，九门会议覆题之辞，其意亦同，岂不大可惧哉……辨诬之举，日急一日，而自明之道，不在于口舌。若不先破可疑之端，则一介行李，虽项背相望，恐无益而徒劳，穷天极地之冤，将何日而得雪乎？请姜弘立、金景瑞、李民寏及诸降虏等家属一律依法典照断；胡书之来，一切严斥不答；亟斩金彦春。一以明事大之义；一以绝中朝之疑。[55]

咨文说得很清楚，要消除明廷对朝鲜与后金交往的不良印象，不在于说，在于行，即斩杀援明降将家属，拒绝与后金往来。

光海君对此看法不甚满意，认为"当与庙堂议处，勿为烦论"[56]。

同年十月，光海君派李廷龟作为陈奏使代表朝鲜前往北京向明廷辨解此事。他于十二月从北京回来后，光海君于宣政殿接见了他，并问起辨解的情况如何？李廷龟说了下面一番话：

> 徐光启，天下名臣也。小臣前于往来时，亦闻其声华，而今以辽广之论，国人称之以识时务之人云矣。今若以此洞辨，则恐其光启扶植之辈蜂起而争之也。且非徒陈奏，责立其实，各别整饬军士，入送江边，以为犄角之势。[57]

李廷龟的话很含蓄，其实后金与朝鲜的交往是事实，愈描愈黑，与其向明辨解，不如加强军备，"置重兵以江上，一以助天朝犄角之势，一以防老贼豕突之患"[58]。总之，"亲明派"认为，与后金"移书求和"势必破坏朝鲜与明朝的关系，因为不管用什么方式书写的信件，都可能被努尔哈赤反过来加以利用，以破坏朝鲜与明朝关系，即"今此求和，非为我国，欲其离间于天朝也"[59]。

其实，后金与朝鲜交往并未要求朝鲜必须与明朝决裂，其目的只是努力争取朝鲜在后金与明朝战争中保持中立而已。正如后金官员对朝鲜官员郑忠信所言：

> 交邻之事，是吾汗之至愿。每诸将以朝鲜为言，汗大言折之曰："吾与天朝结怨者不是好玩兵也，只缘天朝种种欺害，

> 不得已背之。至于朝鲜，则素无仇怨。且敌国之多，非我所利也。天下岂有恒胜之国哉！我死之后，汝等必思吾言耳。”⑩

由此看来，至少在这时（天命六年、光海君十三年）九月，努尔哈赤并没有取代明朝的非份之想，也无侵略朝鲜、控制朝鲜半岛的奢望。努尔哈赤对朝鲜“素无仇怨”之论，与光海君等“我国初非仇敌，实无战攻之意”是有可能接轨的，这并不意味着光海君等从本质上反对明朝。

尽管如此，光海君等的双边外交，还是不为元老重臣所接受，一些坚守“宁以国毙，不负大义”的“亲明派”，便于天命八年以辞职向光海君等抗衡。是年正月备边司官员上疏云：

> 臣等驽劣尫残，不足以上赞谋猷，下顿纲维。亟宜勉起元老宿德之臣，尽招独立敢言之士，使廊庙之间，硕画密勿；轩陛之下，谠论峥嵘。公道张而幸门杜，才智进则阘茸退，纪纲立而小吏不敢窥威福，廉耻修而士夫不敢交巫母。至治馨香，守在四邻；奴虏虽强，岂至于千里畏人哉！臣等所言，虽似腐儒常谈，治民御敌，此外皆苟。⑪

当时，“宿德之臣如李元翼以下诸人皆逊退，无一人在朝”⑫。光海君的对外政策及权力基础，危机四伏。可见，光海君被赶下国王的宝座，是可想而知的。

天命八年三月，朝鲜王朝内部发生宫廷政变，朝鲜宣祖国王的王后在“亲明派”元老大臣的支持下，宣布废掉光海君。“王大妃下教书宣谕中外”，对光海君做了下述谴责：

> 我国服事天朝二百余载，义即君臣、恩犹父子。壬辰再造之惠，万世不可忘也。先王临御四十年，至诚事大，平生未尝背西而坐。光海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己未⑬征虏之役，密教帅臣观变向背，卒致全师投虏，流丑四海。王人之来本国，羁执拘囚，不啻牢狴。皇敕屡降，无意济师，使我三韩礼义之邦，不免夷狄禽兽之归，痛心疾首，胡可胜言。夫灭天理，斁人伦，上以得罪于宗社，下以结怨于万姓，罪恶至此，其何以君国子民，居祖宗之天位，奉宗社之神灵乎？兹以废之，量宜居住。⑭

此“宣谕中外”的“教书”虽出自宣祖王后之口，实则代表朝鲜“亲明派”的意愿。光海君被废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表明亲明派上台，后金争取朝鲜失败。新任国王仁祖李倧继位，朝鲜在外交上迅速倒向明朝。

---

①⑤㉔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②《光海君日记》六年六月。
③《清太祖实录》卷5。
④《明神宗实录》卷568。
⑥《光海君日记》十年八月。
⑦《明史》卷239。
⑧⑨⑫⑬⑭⑮《光海君日记》十年四月。
⑩⑪《光海君日记》元年六月。
⑯⑰⑱《光海君日记》十年五月。
⑲⑳㉑《光海君日记》十年六月。
㉒《光海君日记》十一年二月。
㉓《建州私志》卷中。
㉕《光海君日记》十一年三月。
㉖㉗㉘《光海君日记》十年十月。
㉙㉚《光海君日记》十年十一月。
㉛㊱《光海君日记》十一年四月。
㉜㉝㉞㉟《光海君日记》十一年七月。
㊲茅瑞征：《东夷考略》。
㊳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8。
㊴㊷㊸㊺㊻㊼㊽㊾㊿⑤①⑤②⑤③⑤⑤⑤⑥⑤⑧《光海君日记》十一年十月。
㊵指努尔哈赤给朝鲜的书信。
㊶指姜弘立投降之事。
㊹指明援朝御倭的壬辰战争。
㊿④指姜弘立、金景瑞。
⑤⑦⑤⑨《光海君日记》十一年十二月。
⑥⓪《光海君日记》十三年九月。
⑥①⑥②《光海君日记》十五年正月。
⑥③指1619年萨尔浒之战。
⑥④《李朝仁祖实录》元年三月。